

體制。通過重慶教案、至善堂的經營，八省客長成為重慶地方權力網路的核心，其勢力也達至頂峰。光緒以後，會館內部對會產的紛爭、重慶開埠後新的商人勢力的進入，特別是民國以後政局變動，八省客長逐漸失去了重慶商業市場的獨佔地位，漸趨式微。

《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一書，沿着移民社會基層控制體系及其演變這一主題，將宗族、鄉約、里甲、保甲、嘸嚕、客長、團練、學董這些基層控制體系中的個人、群體和組織，按照時間的線索聯結起來，揭示了巴縣社會長達三百年的變遷。如果沒有豐富而完整的檔案留存，要對清帝國的「縣」這種基層政治單位下的地方社會展開深入細緻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深入挖掘、利用檔案史料價值的同時，或許作者需要思考另一個問題：如何跳出檔案的桎梏，對研究對象展開視野更為廣闊的討論？如何對移民社會研究提出新見？作者導師在序言中提出的研究思路值得深思。巴縣當然只是清帝國的一個縣，卻不是一個普通的縣。明清時期，隨着改土歸流政策的推行、官方主導下四川的大規模移民、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表明中央政府對西南三省的控制不斷加強。另一方面，移民對四川的持續開發、雲貴山區經濟的發展，西南三省內部、西南三省與他省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日益緊密。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川東首邑的巴縣，已是控扼西南三省的咽喉，人口的流動性、地方社會的複雜性非四川其他移民縣可以比擬。因此，分析這樣一個更為複雜的移民社會時，是不是需要考慮前人研究移民社會範式的局限性？

段雪玉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吳重慶，《孫村的路——後革命時代的人鬼神》，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236頁。

以往的學術討論往往注重描述20世紀的革命和改革帶來的社會文化斷裂，近年來，許多學者將目光投向研究變遷及其背後的延續。吳重慶十分重視後者的研究價值，《孫村的路》即是作者此種思路下精心打磨的成果。該書由「前言」、「通婚圈·姻親圈」、「陰陽界」、「築路：『權力的文化網路』」、「『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以及「附錄」構

成，是作者對其家鄉孫村長達15年的田野調查所得成果的總結。作者引進社會變遷的視角，從村民日常生活入手，探討孫村初級社會關係及民間宗教生活，展現鄉村真實生活的「變」與「不變」（延續性）。

作者在「前言」中對書名「路」的四個內涵——「軌跡(Route)、小徑(Path)、道路(Road)、趨向(Approach)」的闡釋，恰好是他對該書研究視角、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旨趣的說明。作者從孫村社會關係網路這條「小徑」入手，描述分析了孫村人的地緣和親緣關係、民間宗教信仰，以及修築「道路」（即「路」的第三層含義，指真實的道路）和同鄉同業經濟兩個個案，意圖呈現時代宏大敘事之外的村民的真實生活「軌跡」，從中窺探出孫村的空心化反向運動「趨向」。附錄是作者對父親四年多的系統訪談的記錄，詳實記載了父親記憶中的孫村在革命前以及革命時期的宗族關係、基層管治、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具體情況，這是一份彌足珍貴的口述資料。

第一章作者考察了孫村通婚圈的伸縮和姻親網的親疏變化。該研究提醒學者應注意分析「祭祀圈」、「市場圈」等經典理論在具體情境中的解釋力以及「常識」的適用範圍。作者發現在孫村「祭祀圈」模糊和「市場圈」興衰不定的情況下，「二圈」的解釋力弱化，因而需轉向更可操作的「通婚圈」理論。孫村的通婚圈不擴反縮，這與社會開放帶來更廣的交往範圍的「常識」相悖。至於姻親圈的親疏變化則通過「例」來考察。「例」指「民間事關敬神拜祖、婚喪嫁娶、人情往來的成規」。（頁20）弔詭的是，毛澤東時代疾風暴雨的運動下孫村婚禮和維持姻親關係的「例」如常進行，在後毛澤東時代寬鬆的社會條件下村民反而喜歡修改舊例，這又和「常識」相違。作者認為，「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及經濟政策對農村價值觀念和家庭觀念的衝擊更甚於革命，村民日常行為是對新政策新生活的調適，但他們沒有和過去決然斷裂。在了解大背景情況下，從微觀行為來解釋孫村這兩個「反常」現象更為合適。

第二章是本書最長、着力最深的一章，由四篇研究民間宗教的論文構成。作者不沉浸於對科儀或神秘現象的描繪，而是着眼於「人」本身。他發現革命並沒有使鬼神在民眾生活中退場，象徵村莊過去記憶的鬼神同現實生活中的孫村人共存於一個「共時態社區」中。現對該章幾個關鍵點簡述如下：

（1）對「帝國隱喻」的反思。鄉民的神明觀念遠比帝國科層體制複雜，這種複雜性不僅緣於地域差異，更因為時代劇變使民眾不得不按記憶和現實需求重構後革命時代的神靈體系。

(2)「後革命時代」的神。在革命之後，「倖存」的神像或是被砸碎，或是被請進新社廟。這些神明已經「淡忘了上下尊卑的等級意識，各自為政」(頁51)，成為一方社區的領袖，「如果套用武雅士將神明比喻為帝國官員的說法，那麼該官員(神明)顯然已從官場離職，賦閑在家，成了一方鄉紳」(頁51)。

(3)鬼。鬼是指處於不合法且不自然的位置的魂。人之所以畏鬼，不僅在於鬼會害人，還在於人鬼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人在時空面前有極大的局限性，而鬼卻能知前緣舊事。後革命時代神明力量的萎縮使得失去約束的野鬼更是為所欲為。

(4)「後革命時代」的人。為應對日常變故，普通村民需從往時經驗尋找現時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使知往事的鬼神頻頻被「引入」現實生活。普通村民之外另有作為神人交流媒介的童乩。隨着男性村民的外出和活動範圍的擴大，童乩向女性化和管轄範圍擴大的趨向發展。作者發現童乩的影響範圍隨着時間的推移由近及遠呈圈層結構擴散。

「後革命時代」的人對往時資訊的需求，帶動掌握連貫信息的鬼神的在場，人鬼神在共時態社區中頻繁互動，上文為了闡述之便，將三者分開來說，實是簡化了作者原意。

第三章從「築路」的個案入手，分析公共事務興辦過程中「民間權威」這一角色的興替，這是展現社會關係和權力利益糾紛的合適途徑。一方面，政權或神權皆可能成為民間權威的授權來源，獲得權威的人物得以在鄉間進行民眾動員和集資活動；另一方面，宗教型和政權型民間權威可相互利用和收攏，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民間權威的威望。

第四章作者通過對孫村同鄉同業經濟方式的分析，提出「鄉村空心化反向運動」的趨勢。孫村人以孫村為各種生產因素的集結地和流轉地，形成遍佈全國各地的「打金」業，「這是經濟史上罕有的『中心—邊緣』格局的翻轉，鄉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邊緣」(頁147-148)。親緣紐帶和本土社會網路支援了在外的孫村「打金」人，同時本土社會網路的功能也得以充分維持和放大。「『離土離鄉』的經濟活動並沒有成為離析本土社會文化資源的毒劑，相反，二者之間一直處於相互激發的動態過程之中。這一動態的過程，構成了孫村的『空心化』反向運動的趨勢」(前言頁3)。

總而言之，作者全書意在描述分析鄉村的微觀生活邏輯，打通「過去」和「現在」，呈現真實的社會變遷和延續。在反復研讀這部著作之後，筆者認為它有以下優長之處：

首先，本書的內容生動，理論深刻。書中文字細膩，材料生動，語言深入淺出，擺脫了一般學術著作的晦澀。這是一本有「情」的書，更是一本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學術著作。作者修正和補充了部分「常識」和主流理論，同時將一些學界逐漸關注的新生鄉村現象抽象為具備較強解釋力的理論概念。

其次，作者以「本地人」的視角進入鄉村，理解鄉村。這裡所謂「本地人」，一是指作者是本村人，二是指作者理解和站在當地人的立場。本村人研究自己家鄉的優勢是容易進入，但同時也存在劣勢。在〈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讀書》，1990年，第10期，頁3-11）一文中，費孝通曾回答了 Edmund Leach 的兩個問題：（1）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對象是否可取？（2）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作者在相關問題的講座上也曾遭遇微型研究意義的問題。此處將說明第一個問題，將第二問留待下文。Leach 認為研究自己熟悉的社會會被私人的偏見所歪曲，這就是「本地人」的劣勢。筆者認為這種歪曲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受個人喜惡的影響，二是對熟悉的事物採取漠視的態度，無法發現問題。作者會如何回應我們不得而知，作者是否受個人喜惡影響或漠視熟悉事物我們也無從知道。但可以發現，作者時常保持「驚異的態度」審視和分析這個鄉村社會，他取材於身邊之人事，通過這些平常的現象得出了人意的結論，這說明研究者只有對熟悉的社會存有足夠的觀察力和敏感度，才能充分發揮本村人的優勢。

作者站在當地人的視角來分析和理解孫村人的行為邏輯。他沒有從精英視角出發將農民視為愚昧之人，沒有將農村視為「問題鄉村」而急於改造鄉村。政策和村民意見衝突的原因往往就在於政策制定者不了解當地人的想法，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作者無意於改造鄉村，卻從側面給了鄉村治理者一個提醒。作者研究孫村又可說是一種精英視角，作者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和他精英分子的知識儲備息息相關。作者是中國哲學專業博士出身，因此具備了深厚的「大傳統」的文化背景。鄉村社會中為普通百姓所遵循的「小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傳統」的引導，同時二者又處於互動互補的狀態。具備大傳統修養的學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民間社會的小傳統，這也是做農村文化研究的學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後，它具有類型學意義。作者曾公開表示他無意於也不可能把本書的研究結論普遍化。但是，從費孝通對 Leach 第二問的回應中，我們可以找到這種微型研究的類型學意義。費指出，他所研究的江村是一個具有一定地理

和人文條件的中國農村，它在某方面能代表一些中國的農村。孫村同樣具備這樣的意義，作者在研究孫村時曾借助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巨區理論和姚中秋的「錢塘江以南」之說，指出孫村在地理人文上具有東南沿海一帶村莊的某些代表性特點（〈「界外」：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從民間歷史文獻學的角度對福建一帶民間社會進行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孫村的路》一書從另一角度豐富了對該地區的研究。孫村也許稱不上某個個別事物的典型，但千千萬萬個農村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更接近中國農村的整體，這也是費孝通所期望的。

綜觀全書，作者關注時代宏大敘事背後的鄉村真實生活軌跡，提出眾多助益於中國農村研究的見解和理論，同時為讀者深入了解該地區農村生活開關了一片新天地。

王婉雯

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